



YANG XIZONG: BRILLIANT DESIGN

杨锡宗：近代，从景观设计切入到建筑设计的翘楚

(文/图) 黄元炤

毕业于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中国（近、当代）建筑研究与观察家，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设计艺术（ADA）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研究所主持人

Yang Xizong began his career as a landscape designer to become one of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s. During the 1930s, China experienced two architectural movements. The first was international modernism and the second was national renaissance or neo-classical. Most Chinese architects worked between these two styles, designing for particular clients. Yang Xizong, however, oversaw the conceptual design and layout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mpus, placing neo-classical and high modern buildings within Chinese landscape aesthetics. The Sun Yat Sen campus remains one of the few examples of successful fusion design from

the 1930s. In this essay, Huang Yuanzhao walks readers through the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mpus, drawing attention to notable design choices, such as the neo-classical arch that marks the entrance to the campus as well as the high modernist design of the Teachers' Dormitory. Huang also reminds readers that even when adapt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design concepts such as the "compound" layout or "main entrance", Yang Xizong introduced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neo-classical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uilding was composed of two doors that together formed a "pavilion" or porch.

全人教育、（广州）岭南中学、（北京）清华学校

杨锡宗，1889年生于香港，籍贯为广东香山县（1925年香山县改名中山县，1983年设立县级中山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中山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管辖）翠亨村，与孙中山先生是同村，早年入（广州）岭南中学读书，在岭南中学受到了“全人式”的教育，除了基础知识教育的训练外，也培养出健全的人格，及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毕业后的杨锡宗直接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但杨锡宗短暂的就读（北京）清华学校后，就因母亲生病便弃学返回广州。

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

回广州隔一年，杨锡宗便自费赴美，在途经日本之际，被当地市政规模及建筑所吸引，原本打算赴美攻读经济专业的他，在到达美国纽约后，便决定改攻读建筑专业，旋即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他与另一位著名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成为了同学，两人自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也各自发展，杨锡宗学习5年后于1918年回国先暂居香港，后受广州市政厅聘为工务局技士（1921年），吕彦直于1918年后留在美国发展，入纽约墨菲 Murphy & McGill & Hamlin 事务所工作，之后吕彦直于1921年回国，被墨菲雇用并负责墨菲在上海分公司的设计任务，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花园都市”、筹建公园

杨锡宗与一般建筑师不一样，他早期实践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公园、墓园、陵园的设计，这归根在当时“时代背景”的因素下。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建市后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孙中山曾在他所著的《建国方略》一文中提到：要把广州建成一座“花园都市”（中国人的“园林艺术”发展至今有“花园”的概念，但没有“公园”的概念，“公园”

来自于西方，日后“花园”和“公园”演变为异曲同工的模式）……至此广州有了建“公园”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前广州是没有公园的），于是广州市政厅工务局开始选址，在广州城内外筹建公园，共兴建了3处：第一公园选在清朝巡抚署旧址，第二公园选在东较场，第三公园选在海珠一带。杨锡宗便担负起了广州第一公园的设计重任。

几何布局、“西方古典”元素、开放式的集会场所

原广州第一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杨锡宗将其设计成一座综合性的“公园”（喷水池、名人大石像、大礼堂兼作剧场、历史文物陈列馆、餐厅、射击场、游乐场等设施）。“公园”的大门是偏向于“西方古典”的巴洛克式，由4根石立柱、弧形铁拱券门楣及通花大铁门（已失落）所构成，4根石立柱由大小两对排开，大小立柱的装饰语言多，有圆球和花盆做柱头装饰，且可看到几何线条的产生。在设计阶段，“公园”也因政局纷扰的原因而一波三折、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前后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1920年才开始平整土地建造。原广州第一公园落成后，成为了一座开放式（通透的铁条围墙）的园地，许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的活动都在此举行，也由于地处市中心，很快地就成为广州重要的集会场所。

“模范漳州运动”、漳州市政总工程师、漳州市政改良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白町乡人，光绪年间中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及黄花岗起义，广东军政领袖，粤系军事将领，中国近代军事家）在漳州经营市政改革，正全力推行“模范漳州运动”，致力建设漳州为“闽南之星”，风闻杨锡宗为建造之人才，即飞电杨锡宗来闽南一聚，两人见面时，相谈甚欢，畅聊漳州未来市政，陈炯明大力赞扬杨锡宗的市政规划见解，便聘请杨锡宗为漳州市政总工程师，赋予实权，从事规划漳州市道等事，于是杨锡宗在设计完原广州第一公园后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就前往漳州履职，专职规划，对漳州市政改良投入不少心血，同时也被委任为石码工务局局长，之后杨锡宗在总体规划设计完成后急流勇退，向陈炯明请辞，但他还是留下了漳州和石码的市政建设大纲和图则，可让后人按图实施即可。

取缔课长兼技士、代理第二任局长、政变辞职

1921年，杨锡宗回到广州后，被孙科邀请任“工务局”取缔课长兼技士（1921年），后短暂地接替程天固代理工务局第二任局长职务（1922年6月~12月），他继续设计完原广州第一公园后，又规划了5座城市公园，同时也被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为建筑委。之后因政变，便辞职离开政界，在家不问政事，专心做自己划则设计本行，自行开业。

墓园景观设计、层级分明、凝重的肃穆之感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始建于1912年，1921年杨锡宗回任“工务局”取缔课长兼技士时才陆续完工，早在杨锡宗设计原广州第一公园时，即受委托负责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后期规划及建筑设计。此墓园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园内有墓亭、陵墓、纪功坊、记功碑、黄花亭、龙柱、默池、四方池、碑廊等，整个墓园，从墓园正门经由缓慢爬升的墓道到达“方形墓台”，由“方形墓台”两侧再绕到纪功坊，再经由纪功坊的门洞到达后方庭园，在下了阶梯后到达了半圆形室外平台，一气呵成、层级分明，是一个完整的墓园设计，或可说是一个“景观设计”。因此，从原广州第一公园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可以观察到杨锡宗在实践初期是先切入“外部空间”、“景观”来进行设计的。而整座“墓台”皆用石砌、石雕（花岗石、大理石）完成，他企图用石头的“重”去勾起人们对于那个年代、那个事件的回忆，也用石头的“重”去呈现一种庄重、凝重的肃穆之感。

独立执业、倾向于“西方古典”、“西式折中”、竖向分割

在公园、墓园的设计后，杨锡宗在业界已获得良好的名声，于是开始接触到建筑项目，这时的他已经离开“工务局”，独立执业（1924年取得香港建筑师注册登记）。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一带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嘉南堂置业公司”的资本相当庞大，准

备投资百余万元兴建大楼，委托给杨锡宗设计。“嘉南堂”东楼原地皮为自来水公司所有，由“嘉南堂”董事先买进，然后高价转卖给“嘉南堂”建楼，1922年开始施工。东楼的圆弧转角处7层高，西侧面为10层高，是一栋沿街面的建筑，一字形布局。杨锡宗在东楼的设计，底层采用“西方古典”的风格，以高大且气势雄伟的石砌拱券形柱廊建在沿街骑楼上，骑楼估计有两层高，内外墙面上有着局部“西方古典”元素做装饰，而底层以上则是竖向的水泥线板做雕饰，辅以规矩排列的矩形窗，装饰的元素较少，由于是钢筋混凝土造，形态上用现代材料去做“简化”的古典样式，是一种倾向于“西式折中”的建筑语言。不难发现，从公园、墓园到大楼的设计，杨锡宗皆大量使用“西方古典”元素，比如：柱式、拱券、拱廊等，因此，在实践初期，他是一个倾向于“西方古典派”的建筑师。

执业的境遇、实践“自立”和掌握“话语权”

杨锡宗与吕彦直两人是留美（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时的同学，同时接受“学院派”的教育，毕业后两人各奔东西，最后都选择回国发展，杨锡宗待在华南（广州、福建）一带执业，吕彦直选择华东（上海、南京）一带，彼此也就少了接触，经过数年后，20世纪20年代中（1925、1926年）的两桩大事件又重新把两人连接起来——孙中山先生“南京”中山陵图案竞赛（1925年）与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碑、纪念馆设计竞赛（1926年）——此两项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重要的设计竞赛，它开展了中国近代建筑师在评选中获奖并实施的重要实践“自立”和掌握“话语权”的意义。

方案中的中西对比

1925年“嘉南堂”建成，孙中山也在同年不幸逝世，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筹备处向全世界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征集陵墓设计方案，杨锡宗和吕彦直都参加了，所提交的方案是两件截然不同的设计，杨锡宗在设计风格上是一位倾向于“西方古典”的建筑师，所以他设计的“中山陵”是完全的“西方古典”化，没有任何“中华风格”的语汇和元素，而吕彦直则充分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体现“中华风格”的建筑语言，并加以变通设计。最终，评出“中山陵”图案竞赛首奖一名由吕彦直获得（当时孙中山家属及葬事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主持人孙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科高度赞赏吕彦直的方案，符合“适用、坚固、美观”的原则，且用石、铜材料，朴实坚固，不易老坏），二奖一名由范文照获得，三奖一名由杨锡宗获得。

竞赛教训、渐融于“中华风格”潮流

20世纪20年代中的重要设计竞赛，杨锡宗虽获奖，也让他名声在全国鹤起，但未获首奖对杨锡宗而言就是失败，且又败给自己同学（吕彦直）。而杨锡宗的失败绝非“偶然”的，因他的方案对当时国人来讲是充满了“洋气”（倾向于“西方古典”），不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和口味（中华风格）。杨锡宗受到此竞赛的教训后，决定不再忤逆于当时为政者所推崇、掀起的“中华风格”的政治引导，之后他的设计开始有了转向，稍往中间靠拢，由“西方古典”转向“中西合璧”或“中华风格”，他也融于20世纪20年代末所兴起的一片全国“大屋顶”的“中华风格”潮流中去。

“中西合璧”、反映华侨存在的事实与意义

1928年获准立案为“私立广洲培正中学”校方决议向海外华侨募捐（共捐得30万元），建造“美洲华侨纪念馆”（美洲堂），委托给杨锡宗设计。杨锡宗在高3层的“美洲堂”的设计上改变以往对于“西方古典”样式的单一追求，在有着拱门、拱窗（帕拉第奥式）及局部装饰元素的“西方古典”的外立面上方，加上一个绿琉璃瓦的“中华风格”的庑殿大屋顶，采取“中西合璧”的方式来对应于一个“华侨纪念馆”（就华侨本身存在的事实与意义——跨足于中西两方）。

大屋顶式的“中华风格”、门廊抱厦的布局

1927年，杨锡宗应李济深之邀设计仲元图书馆。仲元图书馆总面积7600平方米，高2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历时2年，于1930年建成，以门廊抱厦的方式处理。杨锡宗在此项目中已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西方古典”样式、装饰和元素，是一个大屋顶形式的“中华风格”，它的屋顶与广州培正中学美洲堂相似，同样是使用了绿色琉璃瓦的重檐庑殿顶，并用水泥仿了木构斗拱和飞檐翘角，从正面的水洗石米圆柱廊即可视之，墙面是水磨青砖砌，墙脚是花岗岩石，部分墙面和门框饰以雕花，而在额枋、雀替则用了彩绘的瓷片装饰。广州仲元图书馆于1957年已改为广州美术馆馆址。

未忘怀于“西方古典”、布置宏伟与严谨、崇高与尊敬、自由之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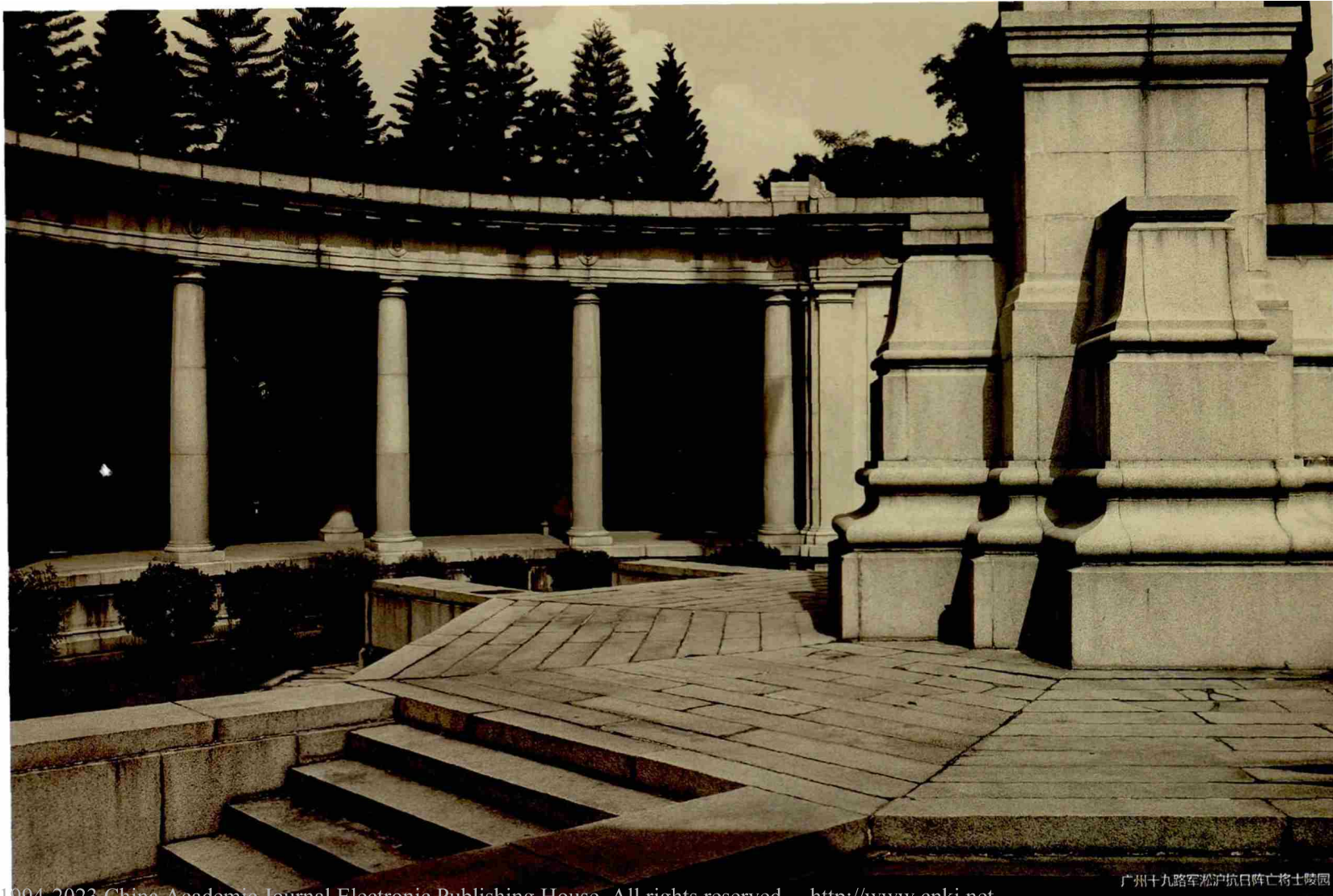
在设计上，虽然杨锡宗于20世纪20年代末转向探索“中西合璧”或“中华风格”的道路，但他对于“西方古典”风格仍然没有忘怀，这从他在1928年设计的“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项目中，仍可一窥。“陵园”规模宏伟，布置严谨，庄重典雅，体现着抗战名将如史诗般的壮烈情怀和气概，墓道中间是“抗日阵亡烈士题名碑”，这是一座带有“西方古典”元素的“题名碑”，绕过“题名碑”往前走，即到达墓道尽头——半圆形纪念广场，是“陵园”的核心部分，由纪念碑和圆弧形柱廊组成。纪念碑有一根纪功柱，仿古罗马式“图拉真凯旋柱”（Trajan's Column），高约19米多，由大理石砌成，柱身仿爱奥尼克柱式，柱头上端有着浮雕，顶部则以圆球做装饰（原广州第一公园大门设计也是此手法）。而纪念碑后方的圆弧形柱廊由20多根仿古希腊神庙石柱环绕而成，两端则是仿古希腊神庙式的门亭，形式已简化，山墙上有浮雕。而圆弧形柱廊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虚实变化，消除了体块的厚重与沉闷，也塑造出一种庄严与肃穆之感，令人衍生出崇高与尊敬之意，体现自由之可贵与向往。

第一期校园规划方案被采纳、任总工程师

20世纪20年代广州“中山大学”校方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便按照孙中山的遗嘱规划建设石碑新校区，古应芬、宋子文、孙科等参与筹建，而杨锡宗与吕彦直在此时又有了连结，他俩先后被校方聘请做校园规划，最终，校方采纳了杨锡宗所提交的方案，这可说是杨锡宗与吕彦直在业界多年来竞争过程中唯一的一次胜利。杨锡宗主要负责第一期校园规划工程，担任总工程师，新校园于1933年动工兴建，1934年秋完工，建有20多座校舍和硬件设施，让农、工、理学院迁入使用，第一期建设资金则来自于中央拨款、国企盈余及海内外各界的捐款。

近似“钟形”的校园布局、影响参考与巧合、山势与水系的结合

杨锡宗在最初提交原“中山大学”校园规划方案，平面呈一“钟形”，这与吕彦直所设计的南京“中山陵”陵墓的“警钟”布局相似，两方案都是南北向的中轴线布置，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可以推测杨锡宗与吕彦直在业界多年来竞争过程中，似乎也受到吕彦直的影响，或者说他参考了“中山陵”的“警钟”布局形式，或者只是一种巧合。

反映“古典复兴”潮流的校舍

杨锡宗在1932年完成了原“中山大学”总体校园规划及第一期的校舍设计，1934年相继建成。有了1929年南京“首都计划”所制定的政治引导，及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人，一级上将，曾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中国近代军事家、政治家）在广东主政期间（1929—1936）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广东复古运动）风潮，所以校园主要建筑皆反映此“古典复兴”的潮流，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采用“大屋顶”式的“中华风格”为主，而杨锡宗所设计的原“中山大学”工学院与入口牌坊也是这种倾向。

仿中国传统“牌坊”、门的风格演变

原“中山大学”入口牌坊是一个仿中国传统“牌坊”（古代表彰功勋、科第、德政、忠孝节义，及祭祖、标明地名所立之“门洞”式构筑物，具有纪念性质）风格和形式所建造，充满着“中华特色”，在中间两柱上方各有一个狮子头浮雕，柱身、柱间、柱头等处雕有云纹、海浪纹、海日等图案，每根柱下方皆有石鼓，表面饰以龙的图腾。入口牌坊当时作为原“中山大学”大门使用，而从杨锡宗对“大门”的设计演变也可发现，他在“古典”的基础上，从“西方”（原广州第一公园）转向“中华”（广州原“中山大学”入口牌坊），中间经历了“折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红铁门）。

“合院”布局、“门亭”特点与不同

在原广州中山大学工学院的“电子机械工程系馆”和“土木系馆”都采取了“大屋顶”式的“中华风格”，在平面布局也皆以“内门廊抱厦”、“合院”的方式（仲元图书馆也是此方式）处理，高2层。“电气机械工程系馆”平面近似于长方形，正面设有两个主要出入口（门亭），“土木系馆”平面近似于矩形，设一个主要出入口（门亭），两侧各设有一个次要出入口。值得一提的是，“门亭”也是杨锡宗设计的一项特点，包括“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的圆弧形柱廊两端的仿古希腊神庙式的“门亭”，及“仲元图书馆”、原广州中山大学工学院的“电子机械工程系馆”和“土木系馆”主入口处的“中华风格”的“门亭”。

绿琉璃瓦的“大屋顶”、仿“古典”元素

“电子机械工程系馆”和“土木系馆”与早前设计的“仲元图书馆”如出一辙，钢筋混凝土框架系统，采用了绿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外墙面用红砖砌成，用水泥仿了木构斗拱、雀替和飞檐翘角，部分墙面和门框饰以雕花。在窗户部分，一、二层皆是规矩排列的钢窗，窗下墙面有着方形浮雕，而入口门亭的两侧台基也仿了“须弥座”样式。建筑内部的门廊围合一个内庭院（天井），门廊由两排对称排列的圆柱环绕，地面是磨石子地板，一层较二层高，设有3座楼梯联系，办公室、研究室、课室等沿着内庭院而配置，每一间课室皆享有充足的光源，且通风良好。杨锡宗除了设计“土木系馆”外，还于1931年参与组建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筹备委员。

“现代建筑”探索、抛弃“大屋顶”、竖向语言、功能化的住宅设计

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正兴起“现代主义”建筑浪潮，杨锡宗一方面在“古典”的基础上进行“中、西方”层面的操作，一方面也没有漠视对“现代建筑”的关注，于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他也开始进行“现代主义”建筑的探索，这从原广州中山大学“教职工宿舍”的设计即可观察到。在“教职工宿舍”的设计中，杨锡宗完全抛弃“大屋顶”形式，仅在正立面的二、三层阳台板下辅以雀替做支撑，及阳台的铁栏杆、建筑顶部墙面上饰以传统的图腾和纹路。建筑正立面中间部分，竖向语言鲜明，材料的单一性（红砖），更突显设计上的纯粹和简单，平面仍是合院式的布局，内廊也用实墙围合，没有任何“古典”的元素，此项目可视为杨锡宗在操作“现代建筑”的一项实验性案例，他在之后的“住宅设计”部分（原广州市银行华侨新村，1946年），则是完全体现“现代建筑”的语汇和精神，手法渐趋成熟。

宏观到微观、“景观化”和“艺术化”、顺应时势和潮流

杨锡宗，实质上是一位从景观（公园、墓园、陵园）切入到建筑的建筑师，设计视点由大转到小、由宏观转到微观……他将公园、墓园、陵园设计逐渐从“简单化”和“单一化”朝向一种“立体化”和“个性化”，并从中探索和演绎“中、西方古典”的许多元素与物件的表情，达到整体性的“景观化”和“艺术化”，他成为此方面的翘楚。当他在进入到建筑设计阶段时，更来回反覆于“中、西方古典”风格的思辨当中，还曾进行对“现代建筑”的实验与操作，由此可知，他不流于俗套，是一位顺应时局、顺应潮流的建筑师，融于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当中去实践着。



